

中国经济发展的能力与效率提升

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徐高(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夏春(银科控股首席经济学家兼金融研究院院长)

韦志超(首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DOI:10.48014/jce.20240402003

引用格式:贾康,徐高,夏春,等.中国经济发展的能力与效率提升[J].中国经济研究,2024,3(2):30-36.

中国经济前瞻：“预期”及其改善

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当下中国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自中央2010年提出“稳中求进”之后,直观表现上为年度增速进入下行过程,有待一个“L性转换”,确认其完结而引领进入了中高速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虽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3年年度增速是站在了5%以上,但是2022年和2023年复合平均增长速度,只有4.1%或再稍高一点,是不满足中央“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规划所要求的保证速度的。所以,现在还面临着如何确定地实现“L型转换”的严峻挑战。

中国的全局性中心任务,是推进现代化以实现“新的两步走”,达于伟大的民族复兴。现在正爬坡过坎,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完成新的“两步走”所要求的第一步15年间年均增速接近5%,而且要进入高质量发展状态。那么这所要解决的使发展态势向好的问题,一定与预期、信心,有密切的关系。需承认,现在所接触到的大量市场信息,仍然是信心不够提振,预期还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虽然已经有一些改善的迹象,但是总体来说的这个状态,还不合乎意愿。

联系着“预期”概念,经济学这几十年的研究中,理论联系实际,有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就是由预期引导出来的结果和前面它的普遍状态,有高度一

致性。比较普遍的预期怎么样,它的结果可能就会怎么样。现在总体而言不必讳言的企业界预期不好的情况,必须在得到扭转后形成支持市场信心的稳定因素,这是考虑宏观经济前瞻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市场预期不好的形成原因,相当复杂。直观上讲,有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必须解决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进入集约型的发展才能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又加之有美关系交恶带来的冲击,疫情延续三年造成的种种不良影响,还有在实际运行中有“双重谬误”这种主观上必须纠偏的问题,等等,引致经济下行的多种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们都影响预期。如果最简单地讲,我愿提及孙立平教授几年前说的“三个感”的问题,就是多因素交织背景下的“方向感、希望感、安全感”这个总体感受问题不能忽视。尤其是民营企业,体量已不止“五六七八九”了,作为主要的市场主体这个集群,如果没有“三个感”问题的很好解决,显然它们是不可能按照管理当局的意愿明显提振信心而“预期”向好,从而解决必然会全局的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问题的。“预期”这个事情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央决策层在这方面的指导方针,已经相当清晰。在2021年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必须坚定不

*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贾康, 61835080@qq.com

收稿日期:2024-04-02; 录用日期:2024-04-03; 发表日期:2024-06-28

移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抓发展硬道理，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之后，又有一系列的指导：党的二十大所要求的两个高标准，一个是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继续支持高质量发展，一个是以制度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来继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实际上也是要催化和倒逼深化改革来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呼应。中央三令五申讲“两个毫不动摇”，又进一步讲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专精特新的发展，让企业能够在数实融合的轨道上实现升级发展，具体落实到2023年新任李强总理主持座谈会，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完成整改”的概念成为这个座谈会的主题，后面又有中央高规格发布的关于发展壮大民营企业的重要文件，在民营企业遇到严重问题的房地产市场上支持新模式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强调房地产市场就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投融资方面要有数十条的组合措施去进而支持整个局面的改进，还有国家发改委在明确组建民营经济发展局之后，致力于落实推出一批绿灯项目。这些都体现着中央非常明确的要求及其贯彻。

所以应当看到，在客观上中国的城镇化伴随着工业化还有相当可观的成长性空间这种支持条件的旁边，又有我们在主观努力方面得到的中央指导。这种情况之下，应该明确意识到，中国经济运行中改善预期是具备条件的，前面所述的这些中央一系列指导方针都是得人心的，都是有利于改善预期的，都是应该起到提振信心作用的，关键就要看怎样在务实的方面更好地动真格。

当然，跟着讲，进一步落实中央精神，确有一些可以点到为止的问题。比如，中央早就强调了保护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

冤案，但是这么多年来，实话实说，真正能够提振信心的典型案例已经在张文中案等有正面效应之后，基本不再出现了。2023年中央说对社会上违反“两个毫不动摇”的错误议论要亮明态度，毫不含糊，予以批驳，以后有关部门说有清网行动，但到现在为止，有哪个代表性的错误议论案例在清网中得到了批驳呢？似乎还真的不清晰。这些务实的事情，我认为是一定要抓住不放的。

无论如何，前面一段时间有这样一些中央指导之下，我们的确应做出更好的努力！2023年前三个季度统计指标出来，终于苗头向好以后，宏观扩张政策加码，前所未有地在第四季度实施预算调整方案，把赤字率从3%提高到3.8%，等等，是积累了对于改善预期有利的政策效应的。在最近的2024年春节长假期的相关经济统计指标上，已经表现了这个迹象，一定要继续努力、加力、“全力以赴拼经济”。

总之，在中国宏观经济大趋势这个方面作前瞻，首先是应肯定还有客观上工业化，城镇化“成长性”空间，制造业大国的大而不强要改变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的成功升级，真实城镇化水平要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目前为47%，最终升级为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合一的高达70%以上的水平，也就是说作中国经济前瞻，还具有韧性、回旋余地和巨大的可进一步挖掘的潜力。中国的企业界近年在讨论中，越来越认同长期主义的行为模式，其实这正是我们企业界人士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应有的选择。那么当然对应的就是信心要提振，预期要改善。只要在这方面把主客观的因素结合好（而且非常关键的是主观方面我们要避免再出现谬误、折腾和违背中央方针的一些低级错误）。

“先立后破”导向下经济和市场均有望回暖

徐高（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当年我国经济面临不小下行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在各项经济数据中，地产投资的显著下滑引人注目。可以说，房地产就是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要稳定经济增长，先要稳定地产行业。

2021年针对地产行业的融资紧缩政策出台以

来，地产行业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2021年以来，我国期房销售面积跌幅超过一半，同期现房销售面积保持平稳。这表明，对期房能否交付的疑虑是抑制地产销售的关键因素。开发商因融资紧缩而信用风险高企，引发购房者的“惜购”和银行的“惜贷”

情绪。而后二者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重了开发商的信用风险。为打破这一恶性循环,需要有力政策给开发商提供大量融资支持。若无这样的政策,仅通过需求面的刺激政策,很难改变行业的困局。而由于地产新开工已经显著收缩,地产供给瓶颈将会越来越凸显,未来房价上涨的压力也不可小觑。因此,无论是从短期稳增长,还是从长期控房价来看,都需要更有针对性的地产政策来化解风险。

过去3年,我国汽车行业取得历史性突破,与地产行业形成鲜明反差。借助新能源转型契机,我国汽车行业在近年来爆发性增长,汽车出口量已跃居世界第一。这充分表明我国在供给面结构转型升级,培育新增长点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但由于汽车

行业体量远小于地产行业,所以汽车行业的大幅增长依然难以对冲地产行业的下降。所以,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并非在培育新增长点方面做得不够,而是国内政策未能守住经济的基本盘,特别是对地产行业过度打压。

2023年12月政治局会议提出了“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导向,表明政策已经看到了问题所在,并会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举措。高层领导重提“先立后破”,矛头直指2021年以来被过度“破”掉的地产行业。地产政策还需往宽松方向做较大幅度调整,才能真正落实政治局会议的要求。地产政策(尤其是地产开发商的融资政策)接下来会往宽松方向走多远,高度影响2024年我国经济的走向,以及各界的预期和信心。

中国经济重现《繁花》似锦,需要三类新质生产力

夏春(银科控股首席经济学家兼金融研究院院长)

最近电视剧《繁花》热播,大家看到了九十年代初期股票市场和外贸市场的活跃。《繁花》的主要故事集中在1991-1994年,大结局我们看到的是1997年浦东东方明珠的建成和香港的回归。去年热播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故事发生的背景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国企改革和4500万工人下岗。《繁花》是《漫长的季节》的镜像故事,都讲九十年代,一个讲经济上行期,一个讲经济下行期;一个讲乱花渐欲迷人眼,万紫千红总是春,一个讲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2001年中国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经济再次迎来了《繁花》似锦的年代,并在“四万亿”的刺激下盛开得更加耀眼。一直到2011年,经济每年的增速都在8%以上,但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再次进入到了《漫长的季节》这样一个状态。2019年4月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就说了: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经历了两轮经济周期,从乐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有理由期待《繁花》再次盛开。这一次的催化剂可能是中国积极参与到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深度合作,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总书记去年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后,专家学者给出一系列解读。例如黄奇帆解释说,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制造,以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新服务,以及以全球化和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业态,形成的聚合体就是新质生产力。

换一个角度,我认为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生产力就是新质生产力,可以从三个类别或者维度去实现。与普通人关注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不同的是,经济学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指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指出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

我认为理解经济下行最有代表性的数据还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世界银行在2020年发表了一个研究指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全要素生产率是基本稳定在3个百分点左右。而2000—2009年的高增长主要来自于有形资本投资的贡献。

世界银行发现,2010—2019年,中国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贡献和前十年相比基本是相同的,这

十年经济下行主要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从前十年的 3.1 个百分点，下降到了 1.1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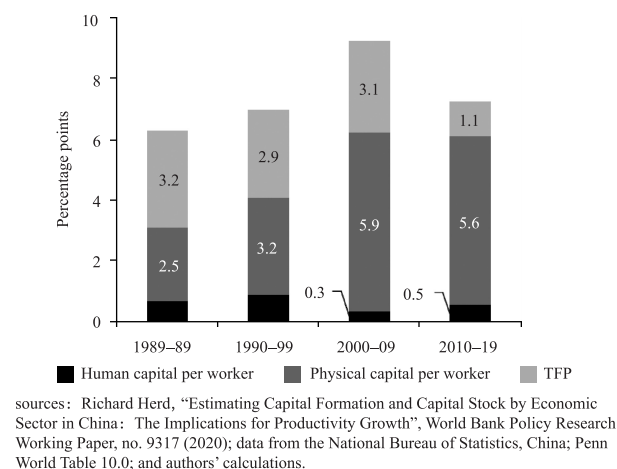


Fig. 1 Decomposition of Annual Average Growth in China's Real Output per Worker

第一类新质生产力

实际上，全要素生产率在 2010—2019 年的下行是一个全球的现象，过去大家说的低增长，低利率和低通胀这样一个“新常态”，本质上是全球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从直觉的角度来说，2010—2019 年恰恰是移动互联网和平台型科技公司发展最迅速的十年，如果我们相信传统智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些新科技和新业态应该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那么为什么数据上看不到这样的结果。

纽约大学的一位教授 Thomas Philippon 发现，无论是美国现在最大的 20 家公司还是每个行业最大的 4 家公司，它们招聘的人，它们进行的投资，它们销售的收入占 GDP 的比重其实都远远小于过去历史上的前 20 大公司或者是每个行业的前 4 大公司（例如通用电气、通用汽车、波音、美孚石油、沃尔玛、AT&T、IBM 等），特别是 2000 年以后的大企业，它们对实体经济，对其他企业的贡献其实是越来越少了。

过去我们希望通过科技创新能够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是数据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其实头部企业在过去二十年时间，它们的规模越来越大，它们的财富越来越多，但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却在减小。Philippon 教授把这个现象称为“大逆转”（中信出版社在今年一月出版了同名著作）。

大家可以想一想，过去常说的“破坏性创新”或者“创造性破坏”，到底是创新多，还是破坏多？过去的经验是不是遇到了新情况？国内争议较大的互联网线上和线下的竞争，如何才能健康发展？这些问题都比原来想象的复杂，不能说只要是新技术，新业态就一定是新质生产力。再比如电影《孤注一掷》生动地展现了大量互联网技术被用于电信诈骗，当然这里还不只是技术作恶的问题，还涉及到法律问题。

我想可以简单地把科学技术分成“赢家通吃型”和“水涨船高型”，前者会拉低全要素生产率，后者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当这样的技术运用到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所形成的生产力，就接近于总书记在 2023 年 9 月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我在 2020 年就详细介绍了 Philippon 教授的研究，多次在演讲中强调“后疫情时代，大企业需告别赢家通吃的发展模式”。

第二类新质生产力

我把进一步学习先进管理实践能力带来的生产力称为第二类新质生产力。斯坦福大学的 Nicholas Bloom 教授提出管理实践也是一种生产力的新理论。不同企业在管理实践上的能力有比较大的差距，这对企业业绩表现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个听上去似乎很普通，但大家千万不要小看。Bloom 教授是过去十年发表记录排第二位的经济学家，排第一位的就是大家都熟悉的 Acemoglu。此外，IMF 在 2014 年评选出了 25 位顶尖青年经济学教授，Bloom 教授和 Philippon 教授分别排在了第一位和第二十位。

Bloom 教授发现，国家与国家之间在生产率上的差异，平均来说，有 30% 来自于企业管理实践的差距，在一些国家这一贡献度甚至超过 50%。用不同维度的管理指标打分，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能力相对过去有很大的提升，平均得分高出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企业的差距依然比较大。另外，中国虽然平均得分高，但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管理能力差别较大，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和巴西。

很显然,第一类新质生产力对应的技术创新是不容易获得的,需要长期的努力,但 Bloom 教授最有意思的发现是,先进的管理实践能力是一种软技术,是可以在短期内提高的。Bloom 教授带领团队在印度纺织企业进行实践,采取五个月的标准化管理实践改进的企业,在一年时间里相比未改进的同类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了 17%,利润多出 30 万美元,而这些企业的平均年销售额为 745 万美元。

说明企业管理实践能力差距的另外一个例子体现在疫情期间,虽然供应链冲击影响了很多企业的业务,但是发达国家一些创造高附加值的企业采取“在家办公”的效果很好,以至于疫情结束后很多工作还可以继续在家处理,但是大家应该亲身体会过,中国企业在疫情期间采取“在家办公”的效果并不太理想。

Bloom 教授与自己的学生,携程董事长梁建章合作,在携程进行了“三天公司办公,两天在家办公”的实验,约 1600 多名员工参与其中,囊括了工程师、产品经理、研发及财务部门等多个岗位。结果发现,员工的工作效率不降反升,员工的满意度大幅提升,离职率也下降了 35%。

因此,提升管理实践的能力,形成第二类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应该加以重视和推广。关键是企业和企业之间,城市和城市,政府与政府之间相互学习,让好的管理实践能力尽快得到扩散和传播。

第三类新质生产力

第三类新质生产力来源于尽快消除要素资源

错配和扭曲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阻力。我认为,中国企业体现在管理能力和科学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源错配带来的扭曲造成的。中国经济学界过去十年最热门的研究领域就是理解资源错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束缚。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谢长泰教授、宋峥教授、白重恩教授等人。谢长泰与合作者研究了中国企业在 1998—2005 年的数据后发现,如果中国企业的劳动和资本可以达到美国企业 1997 年的配置效率,就可以每年提升 2 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

我自己做了一张表,用 20 多个以 D 开头的英语单词来形容中国经济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挑战,比如赤字、债务、违约、去杠杆、贬值、通缩、贫富差距、脱钩、去风险、去碳化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才错位、资源错配。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把资源错配带来的扭曲和束缚看作是一种与新质生产力不匹配的旧生产关系。消除这种扭曲和束缚就是建立新质生产关系,形成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第三类新质生产力。所以我讲的三类新质生产力,同样对应三个 D 开头的英文单词,De-Distortion 消除扭曲,Diffusion,能力扩散,Discovery,促进发现。如果用金字塔来形容,第三类和第二类新质生产力处于底部和中部,第一类新质生产力处于顶部。如果我们不能把底部和中部的基础夯实打牢,顶部也很难培养出来,即使有一些突破,仍然会面临短板,继续被“卡脖子”。

温故知新——中国经济的一个回眸

韦志超(首创证券)

众所周知,经济学界对所有的问题几乎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中国经济过去四十余年取得的成就却有共识。即使摒除“奇迹”等文学色彩浓厚的字眼,我们也可以断言,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可持续的、包容性的增长。

一方面是经济的“超常增长”,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的 46 年年均增速 9%,远高于西方发达经

济体在它们早期的发展阶段约 4% 的经济增速。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均衡增长,我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如果把我国摆脱贫困的 6 亿多人排除在外,同期全世界的贫困人口不减反增。此外,我国产业科技硬实力和文化文明软实力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

的”，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也有相似的特征。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年发布的《增长报告：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战略》中提炼了快速经济增长经济体的5个普遍特征事实：（1）对外开放和利用世界经济；（2）维持宏观经济稳定；（3）保持高储蓄率和投资率；（4）运用市场配置机制；（5）有一个坚定、可信赖且有能力的政府。

我国当然符合这5个特征，但这是从静态视角观察经济，欠缺历史纵深，无法借此观往知来，于是我们需要一个动态视角和分析框架。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献汗牛充栋，沿袭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我们偏好“最少最多”，即用尽可能少的概念解释尽可能多的经济现象，在这个标准之下，一个三因素联动的框架可能是合适的分析工具：要素投入价格——经济运行成本——市场交易规模。价格低廉的投入要素通过高效率的经济体制组织生产并在广阔的市场上交易，是我国过去四十余年经济增长的粗线条叙事。在这个粗线条的叙事中，包含着中农村经济突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经济改革、双轨制并轨、各级政府“置身事内”等等改革开放要件。在这个粗线条的叙事中，是十几亿中国人民在市场的引导下持续深化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生动故事。

要素价格、组织效率、市场规模的变化方向可

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负向的，只有形成正向的合力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幸运的是，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我国的生产要素价格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经济运行效率在市场配置资源导向中持续提升，国际国内市场空间扩大。遗憾的是，近年来上述有利条件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弱化。要素价格不断走高是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何况周边还有经济后起之秀奋起直追。降低经济运行成本的改革措施，容易做的部分可能已经完成，用官方宣传来讲则是“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市场的摩擦日盛更是一目了然。庆幸的是，三因素分析框架也指示了未来努力的方向，要而言之，要素价格虽然上涨，但要素质量也在上涨，我们仍然可以借助后发优势和部分领域的先发优势，使得要素质量增速快于价格增速。经济改革虽然不易，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尚有进一步打开的空间。国际市场虽然摩擦加剧，但国际市场是多元和异质的，并且国内循环可以补充一部分。

回眸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四十余年风风雨雨阳光彩虹，我们相信，未来困难多方法更多，过去精彩未来更加精彩，事在人为、行则将至。

利益冲突：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Enhancing the A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JIA Kang(China Academy of New Supply-side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Fiscal Sciences)

XU Gao(BOC INTERNATIONAL(CHINA)CO,LTD)

XIA Chun(Yintech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WEI Zhichao(CAPITAL SECURITIES)

DOI: 10.48014/jce.20240402003

Citation: JIA Kang, XU Gao, XIA Chun, et al. Enhancing the a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y, 2024, 3(2): 30-36.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Science Footprint Press Co.,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open accessed under the CC-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